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既要有刚性约束又应注重宣传引导

■杜欢政 樊亚男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落实一系列有力的整治举措,厉行节约的良好风尚正在形成。但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制定实施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 杜绝餐饮浪费的必要性

首先,杜绝餐饮浪费是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之中。铺张浪费之风脱离我国基本国情,背离优秀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风气。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中国餐饮食物浪费量约为每年1700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到5000万人一年口粮。惊人的餐饮浪费现象背后存在重虚荣、讲攀比比“面子文化”,也有着忽视环境和资源的不当认识,盲目跟风的从众心理,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此次特别引用古诗“谁知盘中



杜绝餐饮浪费是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方面。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让中华传统的节约美德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并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餐,粒粒皆辛苦”来表明食物的来之不易。这说明节俭思想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和精神永远不能丢。当此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光荣的历史使命、宏伟的奋斗目标、复杂的内外环境,都需要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集中力量办好自己

的事情。其次,杜绝餐饮浪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方面。食物浪费不仅意味着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的无效消耗,而且伴随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浪费的食物作为垃圾混入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系统中,需要被焚烧或填埋。如果直接焚烧处置,由于食物垃圾的含水量高达90%左右,热值为2100~3100kJ/kg,与其他垃圾一起燃烧不但不能满足垃圾焚烧发电的热量需求,而且会产生有毒物质二恶英。如果进行填埋处置,食物垃圾中的油脂会堵塞填埋场的渗滤石层,导致内部渗滤液的淋漓效果不佳,并增加垃圾填埋场的含水量,

严重的还会导致地下水污染。同时,厨房垃圾中的大量油脂和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沼气,高温时极易燃烧和爆炸,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 构建长效餐饮节约机制

杜绝浪费行为,既要从制度层面加强立法,建立长效机制,也要在执行层面采取有力、有效的监管措施,进行监督检查和惩戒。既要有刚性的约束,又应注重宣传,加强引导,营造氛围,不断培养健康、理性的饮食习惯,培育现代餐桌文明。

首先,加强宣传教育,遏制不良浪费风气。虽然公款消费的奢靡之风已经得到遏制,但是在生活中还普遍存在铺张浪费现象。要开展多种形式的餐饮节约宣传,针对不同群体,在学校、单位、社区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戒奢克俭优良传统,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

抵制餐饮浪费。社交平台尤其应加强内容审核,坚决抵制不良风气的传播,重塑网络餐饮节约新风气。

其次,党员模范带头,养成节约习惯。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整治浪费之风,养成节约美德,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示范带头,更有说服力、感召力。党员在生活中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践行“光盘行动”。一方面在外出就餐时,自觉抵制浪费,根据人数适量点菜,不够再加;另一方面少点制作复杂、费工费时的菜肴,避免做菜时浪费,同时如有剩菜应主动打包带走,杜绝一切餐饮浪费的现象。只有党员带头节约,才能在社会中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最后,加强餐饮行业引导,提醒客人适度消费。餐饮行业要建立节俭消费提醒提示制度,在醒目位置张贴节约标识,贯彻节约用餐、文明用餐标准,鼓励顾客点半份菜,及时提醒顾客就餐完毕时将剩余饭菜打包带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消除中国式“剩宴”,最大限度减少餐饮浪费。餐饮行业在提供餐饮服务时,既要尊重客户的用餐需求,又要倡导绿色的消费模式,引导顾客理性点餐,合理消费。

节约美德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让中华传统的节约美德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并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人人都躬行节俭,让节俭节约成为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习惯和修养,那将形成强大的力量,积累巨大的财富。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制图:陈云峰

## 深入学习“四史” 坚守初心使命

# 以唯物史观推进“四史”学习

■王治东

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把握时代的核心问题,推进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就是沿着这个时代问题形成的问题逻辑而不断成熟和发展的。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这既是对理论学习的总要求,也指出了学习的方向与内容,同时也蕴含着理论学习的方法论原则。而唯物史观对推进“四史”学习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唯物史观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个研究成果之一。唯物史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

推进“四史”学习,回到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域中,有助于我们形成“大历史观”。只有把握历史逻辑,才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唯物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类整体历史演进的历史视域中,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历史形态和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从而就有了批判性的理论底气和科学的批判路径,从而回答了属于整个人类的时代问题,也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向何处去,以及解放何以可能实现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时代之间,对这个时代之间的科学回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大历史观”问题。这里的“大历史观”,指的就是要坚持整体化的历史意识,通过长时段、大视角的观察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这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特有表现。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把握时代的核心问题,推进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就是沿着这个时代问题形成的问题逻辑而不

断成熟和发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对时代问题答卷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得到基本遵循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重要的时代问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坚定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具有具体性,都有具体的主体、客体,都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的存在,因此具体的实践活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效性,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或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不自觉性、不确定性。要克服、超越这些局限性、盲目性和不自觉性,既需要反复实践,也需要不断总结反思、分析与探讨。

学习“四史”一方面是学习历史事实,就是在事件、遗迹、遗址等诸多史料中学习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思想史把握发展的时代,形成对历史发展的逻辑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社会主义实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路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着眼时代性,勇于回应时代难题;坚持科学性,积极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坚守人民性,积极创造人民满意的幸福生活;落脚实践性,既是实践总结又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500年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印证了一件事:是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作者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学者笔谈

# 上海文化的“红色”源流

■李瑛

## 海派文化是气质

近代以来,上海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西交融的文化生态,铸造了崭新的文化形态和气质类型。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据统计,1950年的上海人口中,本地籍占15%,非本地籍达85%以上。人口迁移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给上海注入了新鲜血液,增高了文化位势,推动了社会进步。多类型文化的衍生演化,形成了折射沪地移民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的新型大众文化——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基本的核心是开放多元、创新锐进、博采众长、突破陈规。近代上海特殊的城市管理结构,为中西交流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近代性特征,弱化了上海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而移民人口对文化的多元需求,加快了开放型文化的发展进程,使得海纳百川、高度相容成为上海文化最显著的品性,也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有研究者表示:“就思想言之,将来之上海,必为世界新思想之集中地,即为全国新思想之发源地。”

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经历的是“由商而兴”之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和心理倾向的转型,也产生了一种激励奋进、开拓创造的环境。1930年代有人分析上海的文化现象,认为“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因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吐放奇灿的花朵,不单全中国蒙其光辉,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上海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一”。

异质多元的海派文化犹如营素养丰厚的“土壤”,为“红色文化”的孳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底力和不息的动力,上海这座城市在百多年间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第一”,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世界的城市史中颇为罕见。

## 红色文化是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

城市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城市创造力和精神品格的综合表现。西风东渐、移民社会,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意涵与植根于江南稻作文化的本土元素相结合,孕育了近代上海别具一格的都市文化生态。从近代上海文化内涵、外显特征来看,江南文化是基质,海派文化是气质,红色文化是特质,“三位一体”,构成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全息图景。其中红色文化以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为底蕴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彰显出上海顽强坚韧的英雄气节和创新进取的精神品格。

## 江南文化是基质

上海文化的原质是江南文化。上海地处吴越文化圈的东端,它包润江南文化,集聚吴越精华,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吴越文化进取、灵捷、坚韧、聪慧等固有的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血脉中,构成上海文化的基质内核,即如生命基因,塑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生。

吴越之地自古以来民性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左思《吴都赋》曰:吴越之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可见,忠勇强悍一度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特征。南宋之后,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形成了趋文尚礼的文化传统,而江南人自古葆有的勇烈刚毅、无所畏惧的民风,则潜藏积淀于意识深处。晚近以来,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时时显露出这一性格,如明末至死不降的志士,晚清视死如归的辛亥烈士,莫不如此。

“江河与海洋不只是文化的策源地带,而且是文化发达的枢纽。”江南文化构成了上海文化的主要基因,也成为红色文化的主要基因,最终形塑了近代都市文化的内核,导引了前进趋向。当“革命”之声在华夏大地上响起,并且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际,江南文化固有的忠直英勇的精神特质便以不可遏止之势奔涌而出。辛亥革命、五四风潮、中共创建、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举凡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中,无不有上海的声音和身影。

着吉祥喜气、奔放激情,并且还有驱避邪恶的含义。“红色”在特定的语境中,用来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治实践和革命行动。近代上海一直是中国政治的舞台,各种政治力量、政党组织,在这里寻找基础,施展才干,就是因为上海有着各方政治组织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从文化的构成要素来看,充盈着吴越风情的江南文化,彰显着创新意识的海派文化,成为上海“红色文化”的源流。

“红色文化”是近代上海都市属性的外显特性。上海是工商业大都市,也是民族工业的发祥地,1920年,全国工人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38万人,占全国工人数总数的四分之一。统计显示,1950年上海的工人和职员人数有122.9万左右,几乎占全部人口的30%,占就业人口的72%。近代上海中西杂处的社会环境,使上海既是中西交流的窗口,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桥梁”,从另一方面来说,亦是反帝斗争的前沿。近现代上海新思潮风起云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成为革命风潮与社会运动的中心。因此有人从文化融合发展角度出发,对上海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给予评价:“那中国怒吼的第一声定是从上海发出。”

因缘际会,上海成为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因而它具备了灵捷发达的通讯网络、雄厚的报刊出版力量、畅通的大众传播渠道、发达便利的市内外交通设施、良好的公共活动场所。由于地缘优势,上海又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和结合部,人们可以在这里感知、观测世界风云变幻,“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处,统筹办法”。革命志士在此宣传革命思想,这是上海成为政治大舞台的重要原因;当时,上海地方行政格局又使上海出现了有利于政治活动的空隙;上海开埠后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系统结构的重新配置组合,不仅使晚清以来上海人的社会竞争意识、市民意识增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人数既多,又非常集中,且来自五湖四海,与各地有着天

然密切的联系,各种党派政团可以在此找到自己依靠的力量,又可以通过上海,联动全国。“自甲午午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

总之,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信息灵捷、文化繁荣、人才云集,诸般因素互为因应,使上海成为政治力量互竞雄长、政治组织发展力量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正如1949年5月29日新华社发表的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祝上海解放》中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界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社会生态与其自身特质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在上海长期驻守,重要的是“属性依赖”和“性质标记”,是“先进阶级和先进文化相结合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发展的历程,构成了上海近代史光彩夺目的华彩篇章,彰显了对城市文化和精神特质的形塑所起的引领、互动作用。上海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赋予了强劲的动力,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扩大了上海的影响,增添了上海的荣光,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的面貌。

在上海市都市文化的生成过程中,江南文化提供了与西方文化嫁接的母本和基底,东渐的西学与移民社会的“土壤”互相整合孕育了海派文化,风云变幻的斗争实践使上海城市的气节和血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张扬,三者吐纳激荡,相得益彰,亦使“红色文化”之花无比绚烂,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